



苏秉苓 sohpl@sph.com.sg

68岁的谢继成教授，是2011年成立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的创院院长。他2018年退休后，仍活跃于公共卫生教育工作。多年来，他致力倡导公共卫生的重要性，除了关注职场安全与健康，也强调社会必须大力提升对“预防胜于治疗”的重视，尤其对极为普遍却常被忽视的隐形健康杀手。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他走上这条路，这期《早人物》，听他说故事。

鱼丸、墓碑和鞋带，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物品，竟然是谢继成教授走向公共卫生之路的关键契机。

从小在长辈的“洗脑”下，谢继成立志要当医生救人。上小学前，父亲离家出走，留下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六个兄弟姐妹，当时年纪最大的姐姐还在念书。东拼西凑之下，母亲把孩子们拉扯长大。谢继成后来顺利从莱佛士书院毕业，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深造。至于将来要选什么专科，当时还没有切确的想法。

1979年，他念医学院四年级，被派到急诊室轮值。某天凌晨1时左右，一名男子在友人的搀扶下走进急诊部门，友人小心翼翼地托着男子的手。那手被一个棕色纸袋包裹着，男子一脸痛苦。医生们都很好奇：纸袋里到底是什么？

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一台小型绞肉机！

原来男子是鱼丸摊贩，在制作鱼丸时发生意外，半个手掌被卷进了电动绞肉机。医生立刻为他进行全身麻醉，然后安排技师用工具锯开绞肉机外壳，才看到那只被严重压碎的手。随后，骨科外科医生花了16个小时，完成复杂的手部修复手术。

怎知手术刚结束，这名骨科外科医生猛力把手术器械摔在地上，愤怒地说：“这已经是这个月我看到的第二、还是第三个类似病例了！能不能有人去告诉他们，别把手伸进电动绞肉机里？这个可怜的家伙，即使手术顺利完成，他的手接下来半年还是不能用。如果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，那他们一家要吃什么？”

这番话，对当时还在学医的谢继成，冲击极大。

关注病人治疗很紧要 推动群体预防更重要

谢继成说：“医生往往只关注治愈病人，就像汽车修理厂一样。车子撞坏了，我们修好，就觉得自己很棒，因为这辆车还能再跑五年。但这名医生不一样，他不只是‘修车工’，他看得更远，甚至在想：能不能防止类似的悲剧一再发生？”

这种思维方式，在谢继成心中埋下了投身公共卫生的种子，也让他潜意识里更深刻地体会到“预防胜于治疗”的现实迫切性。“对我来说，当医生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预防疾病和伤害。不仅要对个人病人做预防，更要在群体层面推动预防工作。”

后来他在当年的大巴窑医院担任实习医生，更坚定了朝公共卫生领域发展的信念。

有一晚值夜班，病房里挤满了五六十名病人，病床甚至排到了走廊。当时，只有两名实习医生和一名正式医生负责三个病房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。

那天晚上，一名老年患者突然倒下，谢继成立刻抢救。还没处理完，另

早人物

国大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
创院院长谢继成

鱼丸墓碑与鞋带 牵引医者医人到 仁者医心医群众



▲ 在2012年举行的首届新加坡国际公共卫生大会，担任国大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谢继成（左一）与时任卫生部与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璜（前中间）一起击鼓，主持开幕式。（国大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提供）



▲ 1985年，谢继成（中排右二）完成国大医科硕士（职业医学）学位。当年他也没料到，自己为了争取成立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，作为不附属在国大医学院之下的一个学院，差点和国大管理高层闹翻。（唐家鸿摄）



▲ 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于2013年推出Fitness Friday保健活动，让员工每周五从下午4时开始参加一些体能与康乐活动。图为谢继成教授（前右二）与职员一起参与活动的情况。（国大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提供）

一个病房传来呼救声，一名年轻患者也倒下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当时其他两名医生不知所踪，只剩下他一个人应对这一切。

无奈之下，他只能把年长患者交给经验不足的护士，自己全力抢救年轻患者。但就在此时，又一名更年轻的患者因昏迷被送来急救。

那晚，三名患者相继离世。这让谢继成感到沮丧，不断质疑：作为一名医生，职责是救人，但很多时

候却无能为力。

健康宣导走进人群 才能真正发挥效果

“有时问题并不在于个人能力，而是整个系统：为什么在深夜值班时，只有三名医生负责三个病房？我开始对这个体制产生疑问。医生一次只能救一个人的生命，这种影响确实有限。虽然对个体来说意义重大，但从人口层面来看，影响力却微乎其微。”

1987年他开始在职业医学科（occupational medicine）看诊，经常接触不同职业的病患。有一次，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病患抱怨呼吸困难，连爬一级楼梯都气喘吁吁。按职业医学的习惯，谢继成问起病患的职业，后来特地去家访，才发现问题的根源。

原来，病患的屋子后院就是“家庭式作坊”。他从年轻时接手父亲制作墓碑的生意，每天切割、打磨、抛光石材。墓碑石含二氧化硅，打磨过程中产

生大量粉尘。长期吸入，导致他的肺部严重疤痕化，已病入膏肓，谢继成束手无策。

震撼的是，不只病患的儿子从事同样的工作，甚至几乎全村的住家后院都是类似的小作坊：有的做墓碑，有的做大理石台面，所有人都暴露在同样的粉尘中。

“那时我意识到，不能只教育这一家如何预防，而是要教导整个村子。健康意识的宣导工作，要走进人群，才能真正发挥效果。”